

# 东亚文化特征下的“一带一路”新闻话语分析\*

李贵鑫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97;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话语作为语言本真的存在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有话语分析框架多基于西方社会文化特征建构,在东亚文化视域下进行话语分析时存在东西方差异。该差异体现在语言本体特征、社会结构、个人认知等多方面。通过对日本“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进行日本新闻话语分析时应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van Dijk; 东亚文化; K-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 H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6-0017-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6.004

## A Study on Media Repor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ast Asian Culture

Li Gui-x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s an essential form of language, discours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East Asian culture is insufficient in respects of language ont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cogni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discourse analysis framework was established mainly on Western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iscover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 discourse analysis by examining Japanese media repor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doing so, it also examines Japanese speakers' subjective attitude by using unique Japanese declension, tone expression, and change of speaker membership group in order to serve certain privileged classes.

**Key words:** van Dijk; East Asian culture; knowledge-devi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语言应用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词语、从句、句子或命题的抽象结构分析,而是作为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认知性这个多模态话语完整体系的一部分(van Dijk 2011: 4)。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的衔接、连贯、意义和结构等语言现象,而且把话语看作建构社会现实、体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Fairclough 2010: 9)。西方话语分析无论是采用的研究方法还是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以西方文化衍生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为中心,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这种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本文以 van Dijk 的话语交际 K-机制为理论基础,讨论东亚文化特征下话

语分析须关注的问题,为以中国、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特征下的话语分析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 1 van Dijk 的话语交际 K-机制

van Dijk 对于话语分析的贡献主要为“话语—社会—认知三角理论”,该理论是对话语交际模式的系统建构。(van Dijk 2008a, b, 2011; 辛斌 2010, 2017) van Dijk 认为连接语篇与权力的关键便是认知,或者说社会认知,它包括心智模型、态度、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同知识构成社会认知的基本框架,由社会文化价值等相关概念组成,间接操控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群体成员的话语和语

\*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语义模糊性产生根源的哲学阐释”(16YYE09)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东亚文化视域下的话语分析研究”的阶段成果。

言表达(辛斌 2017: 15-18)。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出一个共同体的社会认知标准。意识形态隐藏在话语之中,背后代表着社会阶层的权力。意识形态通过听话人对话语意义的认知影响听话人,进而为权力服务。van Dijk 承认意识形态具有跨文化的特性,不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可能不同(van Dijk 2011: 389),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会影响该意识形态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是知识,知识比意识形态更加根本,意识形态为某一特殊群体共享,维护该群体利益。知识为一个(大)共同体达成一致的信念(同上 2003: 85),知识为整个(大)共同体共享,为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所假定(同上 2011: 385),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间可能共享同一部分知识。

基于知识的共享机制, van Dijk 提出一种交际模式,在交际中说话人要了解听话人的背景知识,确认交际双方背景知识中的共享部分(common ground),推算出交际过程中应该预设或提醒听话人的知识,辨认双方的社会身份以及所属的知识社团,从而操控各种知识来源,确保话语认知匹配现存的交际情境, van Dijk 将这种交际模式称为 K-机制(knowledge-device)(辛斌 刘辰 2017: 17)。K-机制是一种交际模式,规定交际双方能够完成交际的前提是双方拥有共享知识,但双方也可能因所属不同意识形态共同体导致社会认知能力不同。K-机制要求说话人充分考虑听话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推测出听话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内容,并在组织话语时对该内容进行预设或提醒。如果听话人同说话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二者由文化背景衍生出的意识形态部分则存在较大差异。文化背景不同衍生出的差异部分主要表现在语言本体、社会结构、个体认知等方面。

## 2 东亚文化特征下的话语研究

西方话语分析基于西方文化特征展开,多聚焦在西方社会关注的问题。当代主流话语研究将不同文化语境的话语均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分析,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失真。因为不同文化共同体衍生出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结构、认知模式等。

### 2.1 话语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由人类代代相传的实践和知识构成,是一个群体习得、共享的行为模式特征。群体成员通过观察、模仿、尝试和犯错来学习如何融入该群

体(Keating, Duranti 2011: 333)。van Dijk 的理论中虽未将文化因素单独列出进行讨论,但其理论框架中文化因素无处不在。文化是一种经过前人检验,由现代人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经验如果被一个特殊共同体中大多数人共享,则经验转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经过几代人的检验,对其价值认同保持不变则转变为文化,多个共同体对其价值认同一致则可称之为知识。根据 K-机制可知,保证说话人与听话人能够正常交流的基础是双方具有一部分共同的社会认知能力,形成共享社会认知能力的主要基础是“永远为真的知识”部分。知识不能被怀疑,在某一时期、某一群体中永远为真。知识作为意识形态的深层内容,代表着意识形态共同体中不可评价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但存在真假,还有好坏、是否被禁止等评价意义,具有多元性。意识形态中能够进行价值和规范评价的部分主要来源于不同的文化。

### 2.2 东亚文化特征下日语话语分析

van Dijk 建立的话语分析体系主要在 3 个层面展开:心智表征与加工层面、话语秩序层面和社会秩序层面(辛斌 刘辰 2017: 18)。研究角度涵盖话语本体、社会结构、参与者身份、参与者认知能力、参与者思维习惯等诸多方面。日本社会文化具有典型的东方色彩,加之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日本独有的社会文化。同时,日语的黏着语特征同英语、法语等西方国家主流语言有较大不同,因此日语话语分析应从主体间性、个人认知、话语本体、社会结构几个方面进行。

#### 2.2.1 主体间性

人类主观意识所具有的个性决定不同社会的个性、特殊性、差异性和不可重复性,而人类主观意识的共性则导致人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性、必然性和普遍性。(马红霞 2006: 74)话语作为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必然具有“对话性”。具有“对话性”的实践活动必然涉及两个主体,即存在主体间性。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身份(如权力、地位、亲切感、性别、年龄等)对定义交际情景的作用很普遍,基本的认知条件,如共有的知识和信念、意图和目的,则可能是人类互动的普遍共性。(汪徽 张辉 2014: 15)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对话中说话人将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传递给听话人。话语的参与者是否属于同一文化背景,拥有多少共享知识(主观意识共性)、个人认知能力(主观意识个性)是否相似等因素直接影响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活

动。话语分析者作为审视这一过程的“外位性”分析者,主要考察话语以何种形式传递隐藏在其中的意义潜势,通过分析话语特征可推测话语目标人群的社会身份,该目标人群如何作为听话人认知话语背后的意义潜势。

#### 2.22 个人认知

日本文化特征形成独特的日本式思维习惯,日本社会结构特点影响日语表达习惯模式。隐喻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表征,是语言中同文化联系最密切的部分,最能反映各个民族思维的同异(王守元等 2007: 48)。隐喻的使用特点从一个方面反映该群体内文化的特点。日语中隐喻使用的特点是,在喻体的选择上多选用与社会生活或自然环境相关的品类,如动物、植物、自然现象等,反映出日本社会尊重自然,社会生活同自然紧密联系等生态文化特征。

#### 2.23 话语本体

日语无论是书写习惯、词汇类型,还是句子结构均同英语等西方主流语言有较大不同。英语采用表音表记方式,日语采用表音、表意文字混合表记的方式,表意文字多同汉语一致,也有“峠”“辻”等自造文字。日语词汇系统拥有较多拟声拟态词、身体词汇、气象词汇、动植物词汇等。词汇使用上,日语中存在明显的差别语,如女性用语、老人用语等,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

日语属于黏着语系,在结构上与汉语、英语均不相同,需要黏着成分将其他语言成分连接起来,同时黏着成分也承担一定的语法功能(李贵鑫 2017: 12)。日语句子常省略主语,以谓语为中心展开,且谓语位于句末。日语句子的谓语结构复杂,有的与命题有关、有的与说话人语气有关。主语的隐现、人称代词的意义、动作的语义指向均与谓语相关。(于康 2011: 241)日语句子不同于英语句子的“主谓宾”结构,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为“主题—述题”(于日平 2011: 323),因此进行日语话语分析时无法完全沿用西方语法框架。日本属于高语境文化社会,日语在使用中具有多用省略、模糊表达、避免断言等特征(加藤 2009,石黑 2013)。在话语语言据性方面,日语语言据性可以通过特定词汇或特定语法形式表现。日语话语本体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充分考虑日语话语特征,照搬英语话语分析模式进行日语话语分析,必然导致分析的结果欠妥。

#### 2.24 社会结构

日本社会可分为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主要体现在各成员之间身份地位

差别明显,具有较为清晰的等级划分。日本社会纵向结构的特点要求社会成员对自己以及其他成员的所处位置应有准确的认知,并对社会结构具有整体性的把握(李贵鑫 2016: 162)。与西方倡导的“人人平等,个性独立”不同,日本社会横向结构主要指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在一定的区域,不问资历,按照一定条件将一些人划分到一个集团(中根 1967: 29)。日本社会集团意识是一个动态范畴,会根据不同话语场景进行实时切换。在一个公司中A和B分属不同部门,在代表各自部门时两者互为集团外成员,当A和B一起同其他公司的C进行交际时,A和B则相对于C属于同一集团。日本人集团意识强烈,在话语中常使用能够表明所属集团的词汇或表达。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相对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崇尚团结协作,非常重视他人感受,在意他人特别是集团内部成员对自己的看法。日本社会成员间拥有较多共享知识,所以在K-机制的作用下,即便较多使用省略与模糊性表达也不会影响话语效果。作为非日本文化背景的分析者,在分析涉及以上日本人认知特点的话语时,如果不能深入了解日本人认知习惯则很难找到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不能到达预期分析目标。

日本社会早期的宗教信仰、文字符号、思维方式、社会等级、生活习惯等受中国影响颇深。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政治文明诸多方面均照搬西方模式。因此,当代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既同中国相似,又处处受西方影响。日本文化具有东西兼顾的特点,东西方文明在日本社会长期发酵,使日本在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方面拥有东西方双重性格,日本社会意识形态中东西方兼容的特点是我们在进行日语话语分析时不可忽视的。

### 3 日本“一带一路”新闻话语分析

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实践进行知识系统建构,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依靠从某些领域的权力阶层(父母、教师、作家、记者、政治领袖)以及大众媒体的话语中获得,话语分析的对象也多集中在权力阶层话语及媒体话语。新闻语篇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一直是话语研究的重点对象。以往的英语语言学乃至整个西方的语言学研究实证主义倾向突出,只关注语言事实的客观描写。由于分析者自身世界观或思想情感的局限性,对话篇进行分析的结果也难免会带

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倾向。(辛斌 2000: 44 - 47) 日语话语的分析者在对自身局限性有清楚认识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对象话语的文化背景、社会特征、语言本体特征等因素,不拘泥于语言事实客观描写,考察话语背后蕴含的意义潜势、说话人表现潜势的方式、听话人获取潜势的方法等。

### 3.1 文章背景与分析者态度

本文选取《日本产经新闻》2017年5月23日发表题为“「一带一路」構想にみる「中国第一主義」——日本は対抗意識捨て、大胆な構想力を持って”(从“一带一路”倡议看“中国第一主义”——日本应放弃对抗意识、大胆构想)的专栏文章(以下简称文章)。文章主要针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国家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进行评价,为日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应采取的对策提供建议。van Dijk的语言观强调参与者主观性的重要作用,K-机制要求说话人在对听话人认知能力预测的基础上组织话语。文章在语言运用以及表达方式上采用日本新闻惯用的一般方式,表明文章面向的主要读者为日本人,双方拥有较多共享知识,因此较容易预测读者的认知能力。文章通过词汇选择、修辞方式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作为中国分析者,在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从我们关心的问题出发,分析语言背后的意义潜势与权力关系,指出文中话语如何为该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权力主体服务。

### 3.2 话语本体特点

进行话语分析时我们应聚焦于某些具有典型特征的表达结构,以求发现和分析该结构背后隐藏意识形态(van Dijk 2011: 396)。根据语言相对论可知语言塑造观念,语言以各种方式切分自然世界,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同一个事物不会得到同样的图像(李贵鑫 2016: 148)。

#### 3.2.1 情感性词汇

专栏内容可分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以及日本应当采取的对策两部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部分中多次出现“中国第一主義”“中国主導”“為替操作国”等词汇。文章建议日本应采取对策部分使用“先導”“ソウハウ”“決定的”“役割”“実績”等词汇。这些词汇都具有情感性,词汇本身带有作者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因素。情感性词汇的大量使用表明文章具有较强的主观倾向性。文章看似保持公平、客观的立场,实则通过两部分情感性词汇使用差别向读者传递作者的基本态度。

#### 3.2.2 言据表达

言据性是新闻语篇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言据性(videntiality),它主要研究说话人知识的来源以及对知识的态度或介入程度(房红梅等 2008: 96)。言语证素的作用是使文章看似公正,但文章实则代表着作者背后某集团的利益(王国凤等 2011: 31)。新闻语篇中言据性表达是评价新闻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标题“「一带一路」構想にみる「中国第一主義」”的表达属于感官证素。感官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表示直观感受,旨在增加文章的真实感。句子省略主语,模糊感觉的动作主体,意在增加句子的客观性与可信程度。

文章中多次使用的“といわれる”是动词“言う”通过词尾黏着成分的变化形成的被动态表达,这里表示无具体主体的自发性行为,表达“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意义潜势,同样意在增加文章的可信性。英语与中文等言据性的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特殊的词汇完成。日语新闻语篇言据性表达除可以使用特定词汇外,还可以通过特殊的词尾黏着成分变化以及省略主语等方式实现。

#### 3.2.3 语气表达

英语话语分析关于语气(modality)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态动词方面,益冈隆志(1991)指出日语是将说话人主观方面高度语法化的语言,因此语气在日语中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英语中的情态动词。森山卓郎(2010)认为日语表达一般可分为命题同语气两部分,其中语气表示说话人在说话时所选取的表达方式,限制言语行为的意义。

① TPPはトランプ米政権の離脱で11カ国になり、変質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が、日本が主張するようにTPP11でも成立をめざすべきである。//TPP由于美国的退出变成11国,虽然被迫做出改变,但日本仍应主张建立TPP11。

“余儀なくされ”表明说话人对于现状有些许不满但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能被迫接受,是无选择余地用法,文章类似用法还有“米中も歩み寄ら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のである”“中国の指導力に期待するしかなく”“米中関係を融和せ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事情がある”“域内の雇用を拡大するしかない”等。此类用法多用于对TPP协议或美国行为的评价方面,无选择余地用法的动作实施者为美国,意图强调“中美合作”“中美关系缓和”“在朝核问题上依仗中国”等均属于美国无奈之举,并非美方本意。

“べき”属于“当為評価”(义务评价),表示说话人以道德、法律等一般社会准则为基准做出

的判断(仁田 2010: 83)。文章中类似用法还有: “みずから改革を先導すべきだ” “TPPとRCEPの結合という大戦略を打ち出すべきだ” “AIIBとADBの結合を提唱すべき立場にいる”等。句中“べき”的动作实施者均为日本,表示文章的目的之一是站在日本的立场出谋划策,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义务评价语气的使用表现文章强调日本参与中国“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活动是基于对国际社会负责,是道义与责任感使然。

此外,助词“べき”与“ざるを得ない”“しかない”等语气表达表现出文章主旨是主张与建议。文章多用断言,较少使用“だろう”“かもしれない”等。非断言表达虽然可以拉近文章同读者间的距离,但文章通过较多使用断言表达表现作者相对读者处于拥有权力一方,突出文章的权威性,增强距离感,再次表明该文章的目的是提出作者的主张与建议。

语气表现说话人主观态度,日语中语气表达较英语、汉语承担更多的话语功能,日本新闻语篇中表示评价内容时多通过语气表达实现。日语的本体特征使日语语气表达除了可以用特殊词汇实现,主要通过词尾黏着成分实现。

### 3.3 社会结构特点

van Dijk 认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主要是对意识形态图式群体关系范畴的表现,即通过“我方”和“他方”来体现,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意识方阵(the ideological square),包含4种策略:强调我方之好、强调他方之恶、淡化我方之恶、淡化他方之好(van Dijk 2011: 396-397)。意识方阵同个人交际对话时普遍采用的“礼貌原则”相悖。同社会基本交际常识的背离表现出新闻语篇中作者目的隐身于看似公平、客观话语背后。说话人的意识形态决定其所属,该所属通过说话人的话语背后表现的意识形态群体关系范畴表现出来。

② トランプ米政権による排外主義や2国間主義が世界の経済秩序を揺さぶるなかで、アジアから欧州、アフリカまでの広域経済圏はそれ自体、世界経済の拡大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美国特朗普政权排外主义与双边主义给国际社会的经济秩序造成混乱,并且可能从亚洲波及欧非地区。

作者强调美国给国际经济秩序造成混乱,属于强调他方之恶,日本作为美国排外主义和双边主义的受害者,立场同美国不一致,美国属于他方。

③ ここはTPP11にこだわるのではなく、TPPとRCEPの結合という大戦略を打ち出すべ

きだ。そうして初めて2国間主義に傾斜するトランプ米政権をアジア太平洋という広範な地域主義の場に引き戻すことが出来るだろう。//日本不应只将目光放在 TPP11 协议,而应促进 TPP 与 RCEP 结合,这样才能瓦解特朗普带有双边主义色彩的“亚洲—太平洋”构想。

例③属于强调他方之恶与强调我方之好,首先强调美国采取的双边主义给亚太地区带来不安,随即表示只有 TPP 和 RCEP 这两个均有日本参与的国际组织联合,才能够对抗美国双边主义政策。在强调美国给世界局势带来动荡的同时强调日本对于世界局势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在对待美国双边主义的问题上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处于同一立场。

④ 透明性の向上など運営に注文をつけるだけでなく、日米は共同で参加し、みずから改革を先導すべきだ。中国も金融、投資のノウハウのある日米に参加を強く求めている。//日美对于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除了要其在运营上透明化外,更应该共同参与并主导对其进行改革,因为中国也强烈希望具有投资经验日美参与。

例④属于强调我方之好,对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日本应同美国一道参与进来,并且主导亚投行的改革,因为中国迫切需要日美参加亚投行。故意放大日美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此时日本同美国同属一方。

在与美国同盟时使用“日米は共同で参加”强调日本同美国在面对中国“一带一路”问题时处于平等地位,对中国而言,日本同美国同样重要。与亚洲各国属同一集团对抗美国时,特别是同中国合作,促进 TPP 同 RCEP 结合,日本认为自己是“扇の要”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通过意识方阵分析可知,文章中日本立场多次发生变化,体现出日本在国际事务上多次变换所属集团的多变性。

### 3.4 个人认知特点

van Dijk 指出认知是连接话语与权力的纽带,认知着重解释个人心智与神经结构,指社会团体成员主观地产出与理解语篇的模式,表现为具体情境、事件、行动和人物的独特心理表征。(van Dijk, Kintsch 1983: 137) 隐喻的使用特点反映该社会团体的基本认知习惯。关于对日本在亚洲地位的评价,文章采用“扇の要”来比喻。“扇の要”指的是折扇尾部的扇轴,在日语中表示重要的人或事物。文中称日本应促成 TPP 同 RCEP 的联合,因为如果二者联合,同时参加二者的日本将在新联合体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文章使用“实现

する”一词暗示 TPP 同 RCEP 的联合是 TPP 同 RCEP 所有成员国的愿望,强调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具有 TPP 同 RCEP 联合的强烈意愿。类似用法还有在评价美国政策时使用“根を張る”,表示美国政治策略已经拥有相当牢固的地位。评价“一带一路”时使用“絡む”一词,表示“一带一路”像渔网一般同国家安全战略缠绕在一起。日本新闻语篇中使用的隐喻同西方不同,日语中隐喻的使用反映出日本社会民族文化特点,体现日本人重视自然,社会意识中留有远古社会农耕、捕鱼等生产协作的烙印。

#### 4 结束语

van Dijk 提出的 K-机制要求说话人对听话人的社会认知能力进行预判。通过分析可知,文化是影响社会认知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文化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体现在话语本体、个人认知、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现有话语分析照搬西方模式,这种分析方法在进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话语分析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日本“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论证跨文化话语分析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由于新闻语篇的局限性,如模糊表达、修辞手段、引语、语篇连贯方式等方面本文尚未涉及,拟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考察,以期对东亚文化特征下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支持。

#### 注释

①本文例句出自 <https://business.nikkeibp.co.jp/atcl/report/16/071400054/052100025/>

#### 参考文献

- 房红梅 马玉蕾. 言据性·主观性·主观化[J]. 外语学刊, 2008(4).
- 李贵鑫. 日语语义模糊性研究[D].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李贵鑫. 语义模糊类型研究——以日语为对象[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7(4).
- 马红霞. 浅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异[J]. 广东社会科学, 2006(6).
- 王国凤 喻旭燕. 汉英新闻语篇言据性类型学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2).
- 王守元 刘振前. 隐喻与文化教学[J]. 外语教学, 2003(1).

- 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00(4).
- 辛斌 刘辰.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J]. 外语学刊, 2017(5).
- 于康. 日语语法研究[A]. 日语语言学[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于日平. 对比语言学[A]. 日语语言学[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10.
- 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 - 1951*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Ideology [A]. In: van Dijk, T. A.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1.
- van Dijk, T. A.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A]. In: Weiss, G., Wodak, R.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 London: MacMillan, 2003.
-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Pow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a.
-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b.
- van Dijk, T. A., Kintsch, G.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加藤重広. その言い方が人を怒らせることばの危機管理術[M]. 東京: 筑摩書房, 2009.
- 石黒圭. 日本語は「空気」が決める 社会言語学入門[M]. 東京: 光文社, 2013.
- 石上文正. ジャンル、ディスコース群、スタイルの関係について——フェアクラフ理論による社説とコラムの批判的ディスコース分析[J]. 人間と環境, 2015(13).
- 仁田義雄. 認識のモダリティとその周辺[A]. モダリティ[C]. 東京: 岩波書店, 2010.
- 中根千枝. 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M]. 東京: 講談社, 1967.
- 森山卓郎. 基本述法と選択関係としてのモダリティ[A]. モダリティ[C]. 東京: 岩波書店, 2010.
- 益岡隆志. モダリティの文法[M]. 東京: くるしお出版社, 1991.

定稿日期: 2018-10-09

【责任编辑 孙颖】